



大夏书系·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The Courage to Te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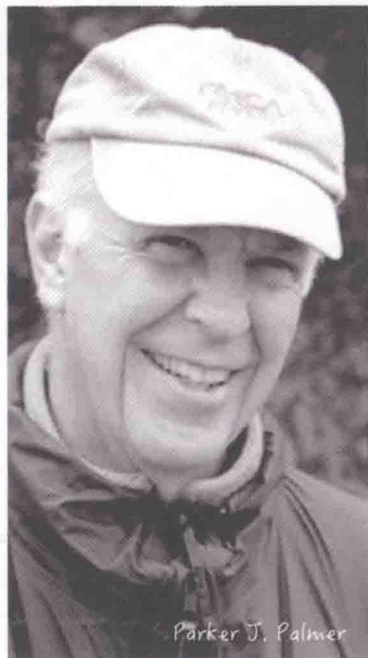
Exploring the Inner Landscape of a Teacher's Life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美) 帕克·帕尔默 著

吴国珍 等译

杨秀玲 审校



Parker J. Palmer

教学勇气

漫步教师心灵

十周年纪念版

本书建立在一个最普通的信念之上：优秀教学不能被降格为技术，优秀教学来自教师的自身认同和自身完善。在十周年纪念版中，帕克·帕尔默回顾了十年来教育改革对教师职业的影响，带领教师走进内在心灵的旅程，把教师的自我、学生和同事重新连结，日趋唤醒教师的职业激情。



上海市
教委
EDUP
上海市
教委
EDUP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夏书系·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The Courage to Tea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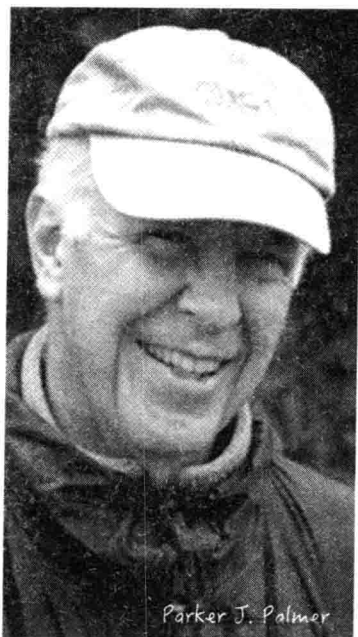
Exploring the Inner Landscape of a Teacher's Life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美) 帕克·帕尔默 著

吴国珍 等译

杨秀玲 审校



教学勇气

漫步教师心灵

十周年纪念版



上海市
著名商
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十周年纪念版/（美）帕尔默著；
吴国珍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

ISBN 978-7-5675-1954-1

I. ①教... II. ①帕... ②吴... III. ①教师心理学—通俗
读物 IV. ①G4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3988 号

大夏书系·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教学勇气

——漫步教师心灵（十周年纪念版）

著 者 帕克·帕尔默
译 者 吴国珍 等
审 校 杨秀玲
项目编辑 顾晓清
封面设计 王晓蕾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插 页 1
印 张 15.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954-1/G. 7287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The Courage to Teach: Exploring the Inner Landscape of a Teacher's Life,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By Parker J. Palmer

Copyright © 1998, 2007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John Wiley & Sons International Rights, Inc. 授权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Wiley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2-730 号

十周年纪念版前言

在撰写《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的十年里，我花了许多时间认真反思过去，预示未来。

我的佛教徒朋友对我说，这种处世方式不好。凡具智慧的传统都极力倡导我们要活在“永恒当下”的真实中，而不是活在曾经如何或可能如何的虚幻中。然而，若没有过去和将来作为素材和源流，无论作者拥有多么丰富的记忆和想象力，都是不可能写作的。尤其对我自己来说，单凭记忆和想象来写人的内心世界，其可信程度是令人质疑的。

事实上，我一边回顾从事教育工作的三十年，一边写作，因为我要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教学总是令我既兴奋又恐惧。我探索着教师生活的内在景观，由内而外，清晰地揭示智力、情感和精神的互动状态如何使我们的工作达成或走样。我要探寻出加深自我理解的方法，进而深化任何像我一样关心教育的人的教学实践。

同时，我一边写一边展望未来。身处一种贬低内心生活的文化中，我希望多做些事：不仅仅是说明好教师必须克己、自省，还试着去理解激发他们生命活力、影响他们更好或更糟的行动的种种动因。我预感到，我们的社会将愈来愈沉迷于教育的外部价值——包括那无情而又愚蠢的标准化测试——我深感其对教育的冲击。我要寻求一些方法来保护和支持位于真正的教学、学习与生活之核心的心灵旅程。

随着时光渐逝，如今我们能够透视过去的全貌。因此，为《教学勇气》十周年纪念版写前言和后记使我更清晰地看到这本书就是源于我自己的教学经验。它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检验本书初版时我

对未来预测的准确程度和对症改善设想的適切程度，这些预测包括当时“尚未通过正规形式发生”的事件。

重温写书前的事

因为我花了十年工夫才完成《教学勇气》初版，所以，对我而言，这本书的十周年纪念更像是二十周年纪念。事实上，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前的整整十年里，很长的时间里，我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题目，接踵而来的是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写满潦草笔记的成堆便条，以及一页又一页的无用文本。在这本书形成的过程中，我多次演讲时都提到过它，以至于一些人以为《教学勇气》已经成书出版了。

那时我开始接到图书馆管理人员的电话：“有人想借一本《教学勇气》，但是我哪里都找不到，我如何才能弄到一本呢？”令他们扫兴的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希望拥有一本，在我把书写成之前，我们都不得不等待。

我用了整整十年来写这本书，部分原因是我写得非常慢。当人们问我靠什么谋生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重写者”。真的，我写的每一页都是反复修改多次后才拿去发表的。同许多作者一样，我写作并非始于一个清晰的观点文。写作帮助我发现我对某事的所感及所知，因为后续的每次修改都推动我进入更深层的发现中，而不知何时停止。

然而，我用了整整十年才写成这本书，又不仅仅是因为我写作慢。我也相信是宽宏大度的上天给我时间来积累和吸收我的两次经历，倘若没有这两次经历，这本书就会缺少根基，缺少诚实，因而也就缺少帮助他人的价值。这两次经验，一次是失败的，另一次是成功的。如今，我把它们都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祝福。

当然，那失败的经历在当时我并不觉得是个祝福。在《教学勇气》首版付梓前的四年里，这本书有时让我感觉像有盼头的一缕微光，有时又像鞋子里的沙子、心头上的疙瘩。我索性在肯塔基州伯里

亚学院 (Berea College) 待上一年, 任礼来项目客座教授。就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 我想起与本书有关的两件事情: 第一, 为什么这个题目如此切中要害 (至少对我来说); 第二, 为什么我需要撰写有关尽其所能地谦卑的教学之道。

从 1855 年起, 伯里亚学院就一直面向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年轻人开办课程。伯里亚学院的博雅教育课程对这些来自美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学生是完全免费的, 学院为这些学生提供校园内的工作, 既帮助学校运营, 又资助他们解决了学习费用。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我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读书时, 伯里亚学院就格外吸引我, 那时高等教育因忽视那些上不起大学的贫困者而受到全面、严正的批评。能在一所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使命的大学里任教, 早就是我的职业生涯意愿的首选。

“小心许愿”虽是老生常谈, 但还是值得留神。在伯里亚学院任教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作为一个过惯富裕生活的北方人, 我对于阿巴拉契亚的认识, 仅仅是从阅读中得来的。对于我和学生之间的文化鸿沟, 我也完全没有准备, 因此, 我没法跨越这文化鸿沟进行教学。我对于他们——“他者”——的亲身体验和了解的缺乏, 导致我自身的“建立联系的能力”——《教学勇气》中的一个关键概念——频频不足。更糟糕的是,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和修补自己的无知。

个人的失落又加剧了这些专业方面的挣扎, 正如我在书中一直坚持的看法——个人与其专业不能分离, 不管是在黑暗还是在充满阳光的日子里, “我们都要教导自己认识自我”。在伯里亚那年的中期, 一个严寒到零下的元月凌晨, 我接到我深爱的父亲意外逝世的噩耗。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安慰, 我崩溃了。

在伯里亚第二学期度过的每一天, 我都得攀爬个人悲痛加上专业失败这座大山, 强行把自己拖回教室。同时, 我内心也在经历着“教学勇气”的潮涨潮落, 且多处于潮落状态。我决不会为了名誉和金钱再经历那么一年, 但那一年确实留给了我一份无价之宝。我更深切地

感受到：教师们的日常工作，我们的教与学，等于攀爬高山峻岭。

在《教学勇气》初版面世前的十年间，我的另一重大经历是一段绝对成功的经历，功劳不在于我，而应归功于那些与我分享的人们。从1994年到1996年，应菲兹尔研究所的请求，并在其慷慨给予的资金和人员支持下，我设计并落实了名为“教学勇气”的项目。在与来自密歇根西南部的22位从幼儿园到高中12年级的老师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成了“向内心世界探索”的领路人，用静修会的形式帮助他们探索自己生活的内心景观。静修会按照一年四季的周期，两年共办了八次，每个季度都花上三天时间。

技术上，是我领导这个项目；实际上，是那些教师在引领我。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持久的功课：我得知，太多的公立学校的教师不得不在令人气馁、饱受压抑，甚至是残忍的条件下工作；我得知，这些善良的人们自发自觉地想办法求生存，而不是坐等别人的援助；我感受到他们心灵深处的、让他们面对再大困难也坚守课堂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为我们孩子们的福祉所作的神圣承诺。

我和这些公立学校的老师一起走过的两年，使我坚信，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化英雄。他们每天要跟那些为社会病态所伤害的孩子们打交道，而且除了他们没有谁决意医治这些社会病患。他们每天还因所谓的种种不足和失败而遭受政府官员、公众和媒体的斥责。然而他们每天仍然对学生敞开心扉，期待以心灵影响心灵，帮助学生们同样敞开心扉。

《教学勇气》面世前的十年里，那些教学的艰难岁月，那些与其他教师相处的欢乐时光，促使我用发自内心炽热的激情来写这本书。当然，**激情**这个词，既可指强烈的爱，亦可指极端的痛苦，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两种情感不仅在语言上相伴同行，在生命里也是相伴同行的。

希望就在这里

今天，《教学勇气》已经面世十周年了。既然历时十年的事件已经“通过正规形式发生”了，不妨评估一下我的水晶球预卜——我当年对于教育的未来、教师的需要、我这本书可能提供的帮助等种种预言——到底有多么准确。

我曾凭直觉预感，教育将更加痴迷于外在的价值，从而挤掉支持教师和学生内在生命价值所需的空間。如今我伤心地发现，这不祥的预感竟如此准确。其实，做出这样的预言并不需要去求教德尔斐神谕^①。那过分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一套一直都在严重挫伤教师士气、窒息真正的教与学而又毫无事实依据的法案——就是只关注量化衡量而轻视真正意义之思维模式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有人说：我们需要量化指标，我们需要细称精量，以加强和实施教育问责。我的回答是：当然，我们确实需要细称精量，但必须具备三个至今我们尚未具备的条件。一是，我们要测量考核真正教育情境中值得测量考核的东西，死记硬背在真正的教育情境中是无足轻重的；二是，我们要懂得怎样测量考核我们准备测量考核的东西；三是，我们要重视那些可测量、可量化的东西，更要重视那些量化工具测量不到但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的东西。

否则我们会发现，我们处于哭笑不得的境地，我认为确实如此，这是杜威（John Dewey）早在70年前就讥讽过的。当时有人问他对智力测验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童年的农场生活经历做了回答。其实杜威的回应，完全适用于许多诸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法案之类的“学习测量”：

杜威……认为智力测验就像他家去市场卖猪前的准备一样。为了算出猪的卖价，他的家人把猪放在跷跷板的一端，在另一端堆砖头，直到两边平衡。杜威说：“然后，我们又设法去算出那

些砖头有多重”。

如今我们所做的，比如测试语言技能，无非是说，在语言技能方面这个孩子值“76块砖头的重量”，而那个孩子值“83块砖头的重量”。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些砖头的重量，况且各种情景所用的砖头种类也各不相同！不管我多么希望是我预测错了，我在1997年预言我们的社会会继续痴迷于教育的外在东西，却不幸言中了。

令我开心的是，我提出的内在心灵互动方式能帮助教师联结他们的学生（借此不断帮助和支持学习）并且赋予他们正能量，以抵制损害真正教学的威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一点也让我说对了。这本书出版后的十年里，我从很多老师那里听到，在艰难的日子里，就是这种教学之道帮助他们深化、更新、支撑他们的教学生涯。我还会在本前言稍后引用一些可以为支持我的教学之道提供证据的研究。

然而，我对这本书的潜在读者却估计错误。虽然面世前，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同一群教师紧密接触，但我以为我的读者应几乎全是来自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我已经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工作了三十年，且有一定的知名度，因而书中引用的大部分例子和插图也都来自该领域。所以，当我得知许多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也都读《教学勇气》时——在1997年，对于他们的领域，我不过是个新手——这屡屡令我感到惊喜和欣慰。

同样令人开心，更令人惊喜的是，这本书也吸引了其他领域的读者群，包括医疗、法律、政治、慈善、神职以及组织领导等领域。自从《教学勇气》面世以来，不断有人问我：“既然你在这本书里所说的很多内容都适用于其他工作，而不仅仅是教学，为什么你不写一本《领导勇气》或《服务勇气》或《治愈勇气》呢？”每一种因“心灵召唤的理由”而吸引人们从事的专业，也是人们和他们的工作因失去心灵而饱受煎熬的专业。跟教师一样，他们也在问：“我们怎样才能重拾心灵，从而拥有完整的心灵向他人敞开呢？”——向他人敞开心灵，正是当初吸引他们承担教师工作的理由。

但过去的十年最令我欣慰和惊喜的是——当然是跟《教学勇气》有关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突破和进展：通过创造各种通道和平台，给我们的理念“加上转轮”，使我们的理念扎根、广为传播，让勇于探索的人们共同分享。

这里的“我们”，指那些完成最初两年的“教学勇气”项目，又跟我一起创立教师成长中心的人——后来，顺应非教师人数不断增加的需要，教师成长中心改名为“勇气和更新中心”。“我们”包括玛希·杰克逊和里克·杰克逊，他俩是创立该中心和维持其运行的联席主管；汤姆·毕奇，罗柏·勒曼，米奇·欧利凡提，以及菲兹尔研究所的戴夫·司旅特；史密斯学院的教授山姆·英特拉托，还有编辑梅根·斯科里布纳，他为编辑出版由《教学勇气》衍生出的一系列书做了大量提升工作，使我们的工作得以广为人知。

今天，勇气和更新中心是通过拥有 150 名经过培训的助导团队——即“勇气合作”团队——来运行的，在 30 多个州和 50 多个城市为人们提供培训课程，帮助各行各业的人，让他们原本的自己跟他们的工作重新建立联结。在我们称其为“信任圈子”的人们中——即在精神上和实践上都认同 1994—1996 年菲兹尔研究所相遇的教师圈子——在不断扩展幼儿园到高中 12 年级教师的核心工作的同时，中心还跟医生、律师、神职人员、基金会主管、政府官员和非营利机构的领导等一起，共同探讨和分享。

正如我在本书后记中所指出的，过去十年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已经证实并发展了《教学勇气》所强调的关于教师和学生内心生活的观点。其中一个发展是 2002 年安东尼·拜瑞克和芭芭拉·施奈德发表的题为“信任学校：改进的核心资源”的研究。这两位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得到罗素·塞奇基金会的赞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深化学校分权管理的 1988 年法令的实施，开始就芝加哥的学校改革进展中的各种互动机制进行探索。”

拜瑞克和施奈德相信，人际关系中的互信是学校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略的因素，因此他们检视这一因素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

响。他们采用标准化测试成绩来衡量，比较了“高信任水平的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没那么高信任水平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当时《教育周报》报道的结果如下：

他们发现，标准化测试结果分数最高的那25%的学校，通常是信任水平高于那些分数位居最末尾25%的学校。他们还调查了1991年到1996年间，在标准化考试中年度得分最好和最差的100所学校，并且将这些结果跟有关信任关系的教师调查数据做了对比。

结果他们发现，1994年具有很强信任关系的学校学生最终在阅读、数学分数方面的改进，比那些信任水平低的学校学生高3倍。1997年，拥有很高信任水平的学校有二分之一的机会被归到“有改进”类，相比之下，信任水平差的学校只有七分之一的机会归到此类。不论1994年还是1997年，学校的教师反映信任水平低的，“则这些学校的学生，事实上都没有任何机会在阅读或数学方面得到提高”。

拜瑞克和施奈德也发现，教师和学校行政管理者之间、教师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信任关系，相当具有有效地抵消外部影响因素的能量，而这些外在因素往常被认为是影响学校很好地服务于学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学术成果提高不可能发生在学生们极度贫穷、种族隔离、学生流动性大的学校。但是这两位研究者认为，即使在控制了上述几个因素之后，相互信任和学生成绩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如果把学生教育好的本领取决于人际间的相互信任，那么，人际间的相互信任又取决于什么呢？很明显，取决于一个教育者对他/她自己的生命“探索内心景观”的能力，凭此学习如何以善于保持信任关系的方式来协调处理这个复杂棘手的领域。

人际间的相互信任建立在人的内心活动上，诸如同理心、承诺、悲悯、耐心以及包容能力。一旦忽略对教育成功很关键的心灵工作，

无视培养上述这些性情品质所必需的心灵工作，忽视抵制种种损害这些性情品质所必需的心灵工作，内在的心灵工作没有制度支持，那么这个关键的变量只能听天由命。我们都清楚在一个不断腐蚀信任的文化里，它会面对什么命运。

拜瑞克和施奈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是，我需要指出——不是评论他俩的研究，而是评论我们的心态——《信任学校》揭示了一个隐藏却显而易见的秘密：谁不知道你可以向**相互不信任**的一群人提供最好的方法、最新的设备和大撒金钱，但结果依然凄惨？谁不知道**相互信任、紧密合作的一组人**，即使没有充足的资源，照样能拿出卓越的成果？

其实，对这些事，我们都心里有数。但一到公众场合，我们就不肯说出真相——真的，我们还主动否认呢——就这样，我们持续不断地屈服于制度控制的虚幻错觉，即人心的逻辑与真实世界的运作是不相干的，真实世界的运转必须产出硬性规定的“底线”。真不知该把这种心态和人格称为什么！分离、抵赖、自暴自弃、麻木不仁、可悲，或简直就是愚蠢的胡言乱语。我想，所有这些词加在一起，甚至用更尖锐的字眼，才能准确描述这种制度综合征的特殊情状。

我很感激拜瑞克和施奈德把他俩的研究发现公布于世。他们劝谕教育政策制定者接受“信任对于推动和激励展现成果的重要性”这一见解，在研究报告中写道：“从政策层面，我们要经常留意，学校的每一项新举措对校内人际关系信任可能是促进还是损害。”

按照他们的提议，我们不妨就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开始，看看这个法案到底对于学校内的信任关系产生了些什么影响。一旦我们认识到它造成的危害——并且认识到当我们忽视心灵的互动和能量时，一个机构追求使命的能力会遭遇什么后果——我们就可能学会如何制定有效促成真正教育改革的政策，因为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对“我们天性的更佳角度”具有感召力，真正扎根于我们对于世界运作共识的情理中，也认真对待师生们生命的内在景观。

致谢读者

最后，我要向我的读者们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教学勇气》刚初版时就购买了三十多万册！谢谢你们跟学生、同事和朋友们分享《教学勇气》！最最重要的是，我由衷感谢你们把书中教与学的愿景带到教学第一线！

跟十年前相比，如今我对教育改革的潜力怀着更大的希望，这是因为通过这本书我结识了很多人，包括学校教师、行政管理者和改革者，他们热切地关心教育、关心学校、关心他们为之服务的学生，并愿意为实践理念承担风险。

就是基于这个希望，我还为十周年纪念版写了“后记”，题为“呼唤新专业人士——教育就是转变”。这里，我探索培养能真正造福世界的新专业人士的途径和方式。这些新专业人士不仅要掌握诸如教学、医学或法律专业领域的核心能力，也要具备必需的本领和意愿，以帮助其所在的专业机构转变——因为往往就是这些机构不断地威胁我们的最高专业准则。

正如本书众多读者已证实了的，“探索教师生活的内在景观”使我们复归本性，扎下根基，重获新生，再面对我们生活的外在景观。当我们真正全心投入感召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就能再一次把我们的的心献给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世界——一个冷酷无情、只向发自内心的受惠慈悲恩典的美德低头的世界。

注 释

- ①译者注：希腊神庙的神谕。

中文版序

60年前，美国哲学家巴赞（Barzun, J.）出版了一本堪称经典的书，《美国教师》，里边有一句话长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教学并非一项不复存在的艺术，但尊重它的传统已不复存在。”

对美国人来说，这句话现在同60年前一样真实，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有许多教师不想让教学艺术衰亡，例如，他们拒绝接受这种荒唐的观点：好的教学仅仅是信息转移，且一台电脑可以做得和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好。然而，坏消息是，这些好教师是在艰难甚至卑微的境况中进行工作，这种境况产生于不再尊重教师和教学艺术的美国文化。

中国智慧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美国人学习。我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曾经与一位中国人产生了深厚友谊，他在我任教的学校待了一年，我是那时候认识他的。虽然我们最后一次对话是在大约25年以前，但至今我对他那富于活力的精神风貌依然记忆犹新。通过他——也通过我自己对中国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我了解到中国文化中古老而悠久的尊师重教传统。

所以我深深地感谢吴国珍教授、杨秀玲教授和余巍博士把我的《教学勇气》译为中文。我希望它的出版会促进两国教育家之间的对话——让中国读者了解，在美国我们正在如何努力重新振兴教学、恢复对它的敬重；让美国人更多地了解那几千年来丰富人类文明、敬重教与学的中国文化。

我们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需要一起努力，以帮助人们认识到，教和学是人类所有追求中最崇高、最迫切需要的！世界的未来依赖于这样的教师和学习者——他们愿意向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我们的内心世界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十周年纪念版）

敞开心扉，向着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宝贵潜能，向着日常生活的潜在价值，向着我们多灾多难的世界所固有的美好未来，敞开心扉。

帕克·帕尔默

2004年5月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鸣 谢

1983年，我出版了《以我们熟悉的方式认知——作为精神之旅的教育》。这本书为我提供了结识国内不同背景的教师并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机会：学院和大学、公立学校、继续教育中心、进修中心、宗教机构，还有各种类型的学习组织：企业、基金会、为社会变革而工作的团体。

与这些非凡的、不同背景的教育者的对话激发我写了此书。《教学勇气》有两点不同于《以我们熟悉的方式认知》：既坚持关注教学实践，又坚持集中探索通往内心生活的途径，我所见过的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的内心生活是向各种途径敞开的。我感谢那些鼓舞我沿着这一思路著述的精神伴侣。

我要特别感谢菲兹尔（Fetzer）研究所的所长罗伯特·莱曼（Lehman, R. F.）先生。我是该研究所的一名高级顾问。在该研究所的一系列计划中，他使我能够计划我的漫长的旅行，从而完成这本书。本书所展示的心灵之旅中有他更慷慨忠实的同伴之谊。罗伯特理解内心生活以及这种内心生活以其罕见的深度和激励力量对行为世界的影响。我深深感激他的洞察、友谊和见证。

与菲兹尔研究所的合作丰富了我的教育经验。我自己的教学主要在大学和成人学习计划中进行。本书新版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来自这些领域。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我通过帮助菲兹尔研究所建立教师养成计划，即在公立学校实行一个两年一贯的教师更新静修班（retreats），了解了幼儿园到12年级教师的生活^①。这项计划现在设有很多分点，如伊利诺伊、马里兰、密歇根、南卡罗来罗那州和华盛顿州。在本书要出版的同时，菲兹尔研究所正在建立一个全国教师养成中心，作为其